

上编 张代会
下编 周 方

著

清初

文学研究散论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初文学研究散论/张代会,周方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378-2977-9

I. 清... II. ①张...②周...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清前期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0917 号

清初文学研究散论

张代会 周方 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bywy.com

地址: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030012

山西省农科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75 字数:25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378-2977-9

定价:18.00 元

目 录

MLL

• 上 编	/张代会
前言	(1)
第一章 清初文学的文化背景论略	(3)
第一节 清初的专制政治及其影响	(4)
第二节 清初文化政策及其影响	(18)
第三节 清初学术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24)
第二章 遗民问题论略	(30)
第一节 遗民探论	(30)
第二节 复杂多样的遗民士人	(38)
第三章 “南施北宋”家世与生平论略	(44)
第一节 施闰章的家世和生平	(45)
第二节 宋琬的家世和生平	(58)



第四章 “江左三大家”心态论略	(75)
第一节 钱谦益之悲剧心态	(79)
第二节 吴梅村的悲苦心态	(87)
第三节 龚鼎孳的复杂心态	(100)
第五章 清初诗歌创作主题与审美趋向论略	(119)
第一节 清初诗歌创作的主题	(119)
第二节 清初士人诗歌创作的审美趋向	(135)
• 下 编	/ 周方
绪论	(145)
第一章 诗坛数杰	(150)
第一节 概述	(150)
第二节 清初江南文学版图中的诗歌流派	(156)
第三节 虞山派的钱谦益与娄东派的吴伟业	(161)
第四节 宣城派的施闰章与云间派的陈子龙	(179)
第二章 词坛二秀	(202)
第一节 清代词坛流派概述	(202)
第二节 阳羨派与词宗陈维崧	(208)
第三节 浙西派及其领袖朱彝尊	(225)
第三章 散文三家	(234)
第一节 概述	(234)

第二节	侯方域的散文	(236)
第三节	魏禧的散文	(249)
第四节	汪琬的散文	(257)
第四章	戏曲的群派	(269)
第一节	概述	(269)
第二节	苏州派李玉的创作	(271)
第三节	李渔的戏剧思想	(278)
第四节	论李渔与李玉的职业戏曲作家与 专门戏曲作家之别	(288)
参考文献		(301)

● 上编 ●

前 言

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判史绪论》中论及清代学术之集大成时说：“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种之外，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称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清代文学可以说是以往各类文体的总汇，呈现出一种蔚为大观的集大成的现象。正是因其突出的文学成绩，近年来，清代文学研究已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取得丰硕成果，本书从清代文学中截取一段，从一个侧面进行探讨，希望能探得清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清初作为清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阶段，首先应该有界定问题。许多专家论及这个问题，认为清代文学分期问题较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困难，原因是其时间跨度大，又涉及到历史政治的“近代”概念，不同的文学史研究学者有不同的分段标准，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李修生的《中国文学史》等等，分期各不相同。由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也论及这个问题，谈到文学创作格局的齐备与文学样式的丰富多元是分期棘手的原因。作者比较倾向于按文学样式研究清代

文学,认为进入文体发展史的内部,才可能谈论一种具体的阶段性,从而避免庞杂、混淆的解释和不必要的纷争。本文因讨论的问题与历史时代的演进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仍旧以政治史分期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

清代初年是一个引人关注的时期。之所以引人关注,一是由于历史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改朝换代;二是由于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了一次重要转型。这种社会变化是全方位的,对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的冲击力量都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一切,很自然要折射到以反映现实生活为内容的文学作品中,也必然要渗透到以文学为表现手段的作家们的心灵世界中。作家的心灵有其自由的能动性,但必然受到历史的现实的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作家的心态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具体表现,而文学作品又促动作家的哲学思想、文学观念以及作家个体与群体创作心态的衍变。这一时期的文学突出呈现了个性鲜明的特征,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一代文学之典范。

本编笔者初涉文学研究,面对各种文体并存,作家人数众多,作品数量浩大的清代文学,从清初文学发生的文化背景研究入手,对独特的遗民现象做了初步探索,而主要着重于作家研究。作家研究一般包括作家生平研究、作家心理研究、作家文学活动研究、作家群体研究等。由于研究比较粗浅和宽泛,也为了便于把握,研究只涉及作家的生平研究、心态研究,而涉及的作家也只限于一方面的研究,如作家生平研究只研究施闰章和宋琬的生平;作家心理研究只涉及“江左三大家”的矛盾心态。基于对清初文学的认识,本编末论及了清初诗歌的主题与审美趋向。通过以上个体的、零散的研究,以期初步掌握文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并基本把握清初文学,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第一章 清初文学的文化背景论略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自20世纪初以来,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

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笔者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与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本章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即是制度层面与思想层面的内容,分别从政治制度、文化政策、学术思想等方面探讨对文学的影响。文学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必然受到一定历史时代的制约,清代的政治、文化制度的影响尤为突出,讨论清代文学不能不谈及这些问题。

第一节 清初的专制政治及其影响

从秦代开始,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政治措施等,都具有专制的特点。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专制政治的突出特点就是:第一,有一个最高的权威,就是皇帝;第二,这个最高权威的权力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即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专制。专制政治从秦始皇开始,逐渐发展,并逐渐地成为一种思想权威、道德权威。这种专制政治到清代发展到极致,并且还具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特点。最显著的不同点有三:一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终其一朝,民族压迫,非常严酷,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在民族压迫下挣扎的文学。二是人口激增、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大量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民与主流社会对抗,这种对抗几乎与清朝相始终,他们以自己的文学表达内心

强烈的思想情感,其政治色彩浓重,起到凝聚自己,打击敌人的作用。三是清末内忧外患日渐紧迫,而统治者腐败无能,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所作出的改革不能挽救衰败的王朝,即使这样,维新派、革命派遭受朝廷缉捕杀害,被迫流亡海外。这些爱国人士写作的一些文学作品简直就是维新政治的传声筒,显示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独特性。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与政治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文学的“兴观群怨”和教化民众的作用,自此以后,儒家思想文学观深刻影响着后代。到了清代,这种意识似乎更为自觉了。统治者常常用政治手段干预文学创作,文士也用文学作品表达自己忠君爱国之情和对政治问题的关切。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民族压迫问题——是不许文人士大夫关注的。文人士大夫只能在传统的民生疾苦问题上表达自己的家国关怀。

清初政治首先表现为屠戮和文化压迫。

清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人数远较汉族少,在其初入关时,还不到一百万人,却统治了有数千万人口的汉族。其征服汉人的过程是极其残暴的。大约经过了20年的屠戮与焚掠,平定了大江南北的汉族人民的反抗,消灭了几个仓卒建立的南明政权,并且运用极为残暴的手段。血腥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满洲统治者残酷暴虐政治的开端。

清代的民族压迫首先体现在剃髮易服。服、髮问题,在中国古代,是汉族人尊严的标志。孔子对于首倡“霸道”的管仲本来是颇有微词的,但是他的“尊王攘夷”的方针,使得中原文化不受异族感染,所以他说:“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孝经》中开篇就讲:“身体髮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当时清统治者“剃髮令”一下,老百姓心中的愤怒、痛苦、椎心泣血……可以想像。“留髮不留头,留头不留髮”这两句话把当时统治者的蛮横和

老百姓的反抗表达得淋漓尽致。

清统治者对于髮制衣冠等小事如此看重,其目的是要以此来摧辱汉族人民的自尊与自信,强迫他们在既往奋斗中已张扬开的人格再蜷缩起来,并充分体现统治者意志的至高无上与不可动摇。汉族人民则由此体味到亡国亡种的痛苦。统治者实际上是借此制造奴性、制造顺民。如果说杀戮是制服汉人的身体的话,那“剃髮易服”就是征服汉族人的精神。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

有清一代,统治者常常把“满汉一体”挂在口边,可是对凡是涉及到满汉的问题,最高统治者都是特别警惕和敏感的。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说清代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实际上汉族官僚只是满族统治者雇佣的奴仆,统治者是要特别注意驾驭和提防的。稍有头脑的汉族官僚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当然个别“天真”的也不是没有),谁也不会得意忘形,忘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因此满汉对立、民族矛盾是直到清朝灭亡,旗人迅速汉化,才消失的。

面对清代的屠戮与精神控制,汉人士大夫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抗争。

明清的嬗代,在汉族文人士大夫看来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他们认为明朝被清朝所取代,不是一般的“亡国”,而是“亡天下”。因为随着满洲铁骑而来的还有剃髮易服和某些价值观念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是通过血与火的暴力实现的,激起广大汉族人民的仇恨。此时尽管也有严厉的镇压,创作环境十分严酷,但文学创作还是常常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同被压迫者或弱势群体站在一起歌颂他们的反压迫斗争,揭露民族压迫的残酷。这些以清初为最盛,后由于统治者的镇压与分化政策,逐渐衰落。但反抗民族压迫一直是汉族人民的一个情结,在清统治者力量衰微的时候,它就会冒出来。我们从清末群众性反清运动中可见一斑。反清运

动绵延了二三百年的。

清初严酷的社会环境给士人的刺激是很强烈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局,仿佛把他们打入了地狱。诗人方文的《涂山集》中有姚康的《序》说:

予自经变以来,举头向天,不复知日月所在。乃读尔止(方文)诗,老眼顿明。盖今之尔止,昔之汨罗,杜陵也,非三君子,此三代遂成黑暗地狱也。

那些敢于挑战政治权力的作品是无边黑暗中的明灯,它们给人们以安慰和鼓舞。这类作品很多,其作者大约可以分三类:一是本来就是抗清之士,起义失败后,继续用笔来战斗,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归庄、钱秉镫、屈大均、陈恭尹等;二是遗民,他们虽然没有参加武装反清活动,但在清一统天下后,采取了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有的还参与了秘密反清活动,这类人很多,著名的有彭孙诒、阎古古、万寿祺、傅山、杜濬、方文等;三虽然投降了清统治者,或参加了清廷举办的科举考试,有了“功名”,但他们对于故国的眷恋,对民族压迫的不满,时时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来,这类作者中享有大名的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尊彝、龚鼎孳、丁耀亢等。这一代作者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作品,从揭露和鞭挞满洲铁骑野蛮和残暴给江南人民带来的灾难,到讴歌汉族人民前仆后继的武装抗暴斗争。著名的像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的“西湖杂感”20首,这个昔日的“软红佳丽地”,被野蛮的八旗兵糟蹋得不成样子:“罗刹江边人饲虎,女儿山下鬼啼莺”、“鹰毛占断听莺树,马矢平填放鹤台”、“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斫面柳攒眉”。另一位与钱谦益齐名的大诗人吴伟业,在他的具有其特色的长篇歌行里常以明的衰亡、南明覆灭和绵延长久的抗清斗争为题材,通过歌咏历史,描写历史遗迹,以及忆旧怀人的方式反映那个

动荡的时代。其中的代表作如《圆圆曲》《临江参军》《悲歌赠吴季子》《松江哀》都是具有强烈倾向性的政治诗。有的诗人对民间的反抗寄予了殷切希望,如归庄就写出这样的诗句:“垄上可能兴大楚,岛中莫便殉田横”、“豪杰由来须兴会,寒灰他日定重燃”(皆见《冬日感怀贻山中诸同志》)、“不信江南百万户,锄耰只向垄头耕”(《己丑元日》)。屈大均更是把这种期盼化为了行动:“慷慨无衣赋。艰虞不世才。平生一匕首,为子入秦来”(《同杜子入秦初发滁阳作》)。这些作品是多么富有鼓舞性和感染性,仿佛是战斗中的号角。表现剃髮与反剃髮斗争就有吴祖修《剃髮二首》、钱秉鐙《留髮生》等。丁耀亢的《剃髮》一诗中写道:“客尘清瓠蔓,霜气到蓬根。故劳镜凭吊,新纓笑独尊。”这里是以自嘲的形式表达对清统治者文化压迫的痛恨。这种挑战权力的现象在小说创作和戏曲创作中也存在。在明清鼎革之际就出现了一些描写这次巨变的时事小说,如《海角遗篇》《新世洪勋》《甲申痛史》《台湾外史》,英雄传奇小说《后水浒传》《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这些小说或写历史,或写当世,但都充斥感事伤时之痛,作者对这场惨痛的变革大多也都是心怀不满的。这个时期的名剧《千忠戮》也是如此。这些面向广大群众的文艺形式与个人性很强的抒情诗又不一样,它有广泛的影响。但是也应该看到严酷的专制统治给清代士人思想的摧残。

其次是清初统治者软硬两手的文化政策。清代统治者对待汉族文人士大夫使用打压与拉拢两手政策。入关之初还是以“拉”为主,有功名的,只要臣服就有官做。康熙十八年国内形势基本安定以后,开博学鸿儒,从全国各地征得学者文士 143 人,取一等 20 人,二等 32 人,名儒才士网罗殆尽,连坚持遗民立场、称病不肯参与考试的傅山也被抬到北京。这种拉拢政策对于清初尖锐的满汉对立有所化解。另外,清统治者从一入关起就表示,他们尊崇孔孟文化,康熙推崇自明初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他为《四书解

义》作的《序》中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这对于重视文化认同的文人士大夫更具有诱惑力。但这只是清统治者对付汉人的软的一手，在他们二百多年的统治中从来没有忘记硬的一手，如加强对汉族士人的管制、迫害，大兴文字狱，这又增加了满汉的隔阂。

硬手段表现为大兴文字狱。

自秦代以来历代都有因文学创作而引发文字狱的，但哪一代都不像清代统治者这样有意识利用文字狱去扼制人们的思想、去摧残文学创造。清代的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胡继光《中国文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皇帝亲自部署和督促把文字狱弄得极为红火。雍正朝有25起文字狱，乾隆朝135起，康熙一朝仅有11起。文字狱不一定是打击在文字上表现出异类倾向的，而是统治者感到有异类存在，通过在全国各地吹毛索瘢式地搜求因文字犯忌的人们，借以震慑民众，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清统治者宣称文字狱打击的对象是对清朝不满的人士或触犯皇帝威仪和忌讳的，可是如果我们对于遭遇文字狱惨祸的各个案子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案子是冤案。那些被凌迟、杀头、被抄家、被发配的不知凡几。真正利用文字或文学作品进行反清活动的不能说没有，但其中绝大部分如鲁迅所说并非“反动”，“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卷六，1956年版）但是既被皇帝选中，大多下场是很悲惨的。

雍正时期黄河中游水色变清，古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说法，于是太常卿邹汝鲁上《河清颂》。本为拍马文章，不料因为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句被革职拿问（因为雍正不喜欢听“维

清初文学研究散论

新”二字,他说自己继位之后一切都是“率由旧章”),这是很典型的因歌功颂德而获罪的例子。乾隆间,山西秀才冯起炎受才子佳人小说影响,把自己“以《易》解《诗》”的“著作”献给皇帝,妄想一举成名,由天子做媒,使得“表妹入抱”,结果被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雍正、乾隆当然未必不知道这些以文字得罪的人们中许多是十分冤枉的。许多立志歌颂和献媚的人也落入了文字狱的法网,似乎是历史的误会,其实不是的。在专制者看来,打击谁并不重要,关键是进行打击才能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人们、特别是文人自顾不暇,不敢乱说乱动。所以在统治者有力量的时候一定要坚持“打击”,当他们“打击”放松,甚至不怎么主动出击的时候,就离他们的末日不远了。清代文字狱从乾隆五十年以后开始放松,乾隆年近八十,体力、精力日渐衰朽,以后不见有主动出击型的文字狱。此后又过了二三十年,敏感的诗人龚自珍才敢吟出他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其实,这个时期已经没有具有震撼性的文字狱了,龚自珍之所以敢写下这样的诗句正是因为它的事实上的消退,另外龚自珍之所以对它念念不忘,也是由于它的余威尚在。

软手段表现为编纂大型丛书。

历朝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文治”,都要组织一批文士编辑大型典籍。这种编书历来就是安排一些文士的手段,免得他们流落民间,成为与朝廷对立的力量;另外这也是实行文化专制软的一手,因为在编书的过程中要对现有书籍全面搜检。对于清统治者来说,这两点尤为突出。特别是到了“康雍乾”的“盛世”期间,统治者借编书对全国书籍进行全面的“搜检”(清代统治者比较聪明,大多情况下是让藏书者们自动献出让统治者搜检)。此期编纂了一系列的大型书籍如《佩文韵府》《骈字类编》《渊鉴类函》《康熙字典》《全唐诗》《历代题画诗》《历代咏物诗》等,修《明史》,后来又编《古今图书集成》,编刻“三通”——《通志》

《通典》《文献通考》和续“三通”等等,直到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把古今所有书籍集为一编,搞一个旷世未有的巨大“工程”。这些一个个大“工程”,仿佛是爱护文化,实际上是在摧残文化。因为对书籍全面“搜检”之后,还要根据统治者的好恶对于它们分别处理。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上集中反映了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四库全书》的编纂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到乾隆四十六年编成,至乾隆五十二年完全抄毕。此编共收书3470种,79080卷。为了编成这部大书,乾隆下诏征集图书。要各省督抚和学政“加意访购”,并说明如果私人藏书系钞本,“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对于“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当各省书籍上呈以后,乾隆皇帝突然转弯,最初说编辑《四库全书》的目的是“稽古右文”、“彰千古同文之盛”(皆见《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可是乾隆三十九年八月的“上谕”开始强调:要借这次征集书籍对于有“抵触本朝”内容之书应予“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见《清实录·高宗实录》,转引自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中国禁书大观》)。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清统治不满,视满洲为狄夷异类的著作,这是要完全销毁的。其二是带有怀念故国明朝,怀念故君情绪的作品,如只存在单篇之中可以抽毁。其三是非圣无法,排击孔孟,讥讽程朱的文字。第四是被乾隆看不顺眼和曾被文字狱牵连文人的作品。于是,“右文”一变而成“灭文”。这是一次全面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围剿。没有哪个时代曾出现过把普天下的书籍聚于天子之庭,由皇帝决定什么该烧,什么该留,什么可以全存,什么应该删改。用皇帝一人的头脑替代天下人的头脑,这场文化围剿把皇帝所不喜欢书籍、不喜欢的文辞统统当作“邪言”消灭,保留的都是皇帝认可的精金粹玉。现在许多文人学者都在赞美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功

绩”，这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乾隆借编《四库全书》对于传统文化毁灭和改篡，借此加强思想的禁锢，在文化史上负面作用远远大于它的正面意义。

在《四库全书》中，不仅与清统治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明末清初的文人的文学或历史作品被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南宋，对于那时的许多文学和历史作品也做了大量的销毁和删改。这种删改和销毁就是清统治者文化政策的表现。这里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被“四库”馆臣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六州歌头》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为“亦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为“一个半个挽回弓”。最让人奇怪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公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公”是他的尊称。这两字都是“仄平”，改动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也与“胡”、“戎”、“夷”、“虏”无关涉。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不够尊重。做惯了奴才的四库馆臣，看着古人那样随便地对待帝王就别扭，所以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的态度。

面对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文人必然作出自己的反应。

这种文化政策把人们变成侏儒，古人不是侏儒也要把他们裁割成为侏儒。从四库馆臣的表现可见，“胡萝卜加大棒”对汉族文人士大夫的奴化还是起了很大作用。如果说由明入清时的文人士大夫许多还重视气节，在诗歌散文这种正统文学形式创作中还表现出反抗力的话，当那一代过渡型文士凋零以后，新一代也就是清代诗文创开山的一代如王士禛、施闰章、宋琬、方苞等，虽